

十三經清人注疏

禮記集解

〔清〕孫希旦撰

十三經清人注疏

禮記集解 王

〔清〕孫希旦撰

沈嘯寰 王星賢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禮記集解/(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89.2(2007.8重印)
(十三經清人注疏)
ISBN 978-7-101-00216-4

I. 禮… II. ①孫…②沈…③王… III. ①禮儀-中國-古代②禮記-注釋 IV. K89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64313 號

禮記集解

(全三冊)

[清]孫希旦撰

沈嘯寰 點校
王星賢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7½印張·6 插頁·1023 千字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數:7301-10300 冊 定價:96.00 元

ISBN 978-7-101-00216-4/B·44

十三經清人注疏出版說明

自漢至清，經學在各門學術中占有統治的地位。經學的發展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而清代則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後的一個階段。清代經學家在經書文字的解釋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證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對我們利用經書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清代的經學著作，數量極多，體裁各異，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體寫作的書，一般是吸收、總結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現在文史哲研究者較普遍地需要參考的書，因此我們在十三經清人注疏這個名稱下，選擇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陸續整理出版。所選的并非全是疏體，這是因爲有的書未曾有人作疏，或雖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選用其它注本來代替或補充。禮書通故既非疏體又非注體，但它與禮記訓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入選。大戴禮記不在十三經之內，但它與禮記（小戴禮記）是同類型的書，因此也收進去。對收人的書，均按統一的體例加以點校。

清代的經學著作還有不少有重要參考價值，這有待於今後條件許可時，按新的學科分類，選擇整理出版。

十三經清人注疏的擬目如下：

周易集解纂疏

李道平撰

尚書今古文注疏

孫星衍撰

今文尚書考證

皮錫瑞撰

尚書孔傳參證

王先謙撰

詩毛氏傳疏

陳奂撰

毛詩傳箋通釋

馬瑞辰撰

詩三家義集疏

王先謙撰

周禮正義

孫詒讓撰

儀禮正義

胡培羣撰

禮記訓纂

朱彬撰

禮記集解

孫希旦撰

禮書通故

黃以周撰

大戴禮記補注

孔廣森撰

(附王樹枏校正、孫詒讓輯補)

大戴禮記解詁

左傳舊注疏證

春秋左傳詁

公羊義疏

穀梁古義疏

穀梁補注

論語正義

孝經鄭注疏

孟子正義

爾雅義疏

爾雅正義

王聘珍撰

劉文淇等撰

洪亮吉撰

陳立撰

廖平撰

鍾文烝撰

劉寶楠撰

皮錫瑞撰

焦循撰

郝懿行撰

邵晉涵撰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五月

本書點校說明

禮記有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之分，前者一名大戴禮或大戴記，後者一名小戴禮或小戴記。通常所說的禮記，都是指後者。傳統的說法認爲大戴記是漢元帝時戴德所編，小戴記是其姪戴聖所編。

漢書藝文志書類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禮類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又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迄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漢書儒林傳也說：「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二戴的生卒年月不詳，其生平之可考者亦僅見於此。

史書最早將二戴之書分別定名爲大戴禮記與禮記，首推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隋志所載，是根

據鄭玄之說。唐孔穎達作禮記正義，引鄭玄的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但六藝論僅見著錄於隋志，久已佚失，今不傳，故正史所載，還是以隋志爲最早。

隋志又說：「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據漢志及隋志所載，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之記爲一百三十一篇，而大戴所傳爲十三卷八十五篇，小戴記爲二十卷四十九篇。大戴之學，漢初雖與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博士，而至東漢時，「大戴無傳學者，唯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立學官」（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故大戴之書，流傳不廣，不爲學者所重視，直至北周才有盧辯爲之作注，而隋志及唐志、宋志均不予著錄。今所存者僅四十篇，始於主言第三十九，終於易本命第八十一，其餘各篇均闕，卷數則與隋志合。小戴之書，除鄭注以外，後漢盧植、魏王肅、孫炎、劉宋業遵、庾蔚之等都曾爲之作過注解，而且陸氏釋文又有禮記音義四卷，孔穎達又作了禮記正

義。其後，宋方慤著有禮記集解，宋衛湜、元陳澧都著有禮記集說，如此等等。正由於此，故小戴記二十卷四十九篇一直流傳至今。

儘管二戴記的遭遇有天淵之別，但兩書的內容與文字却不無相同相類之處。例如小戴記雜記下「成廟則釁之」至「既反命乃退」，祭義「曾子曰：『孝有三』」至「不差其親，可謂孝矣」，各與大戴記諸侯釁廟、曾子大孝兩篇全文大同小異。其餘如聘義之與朝事篇，喪服四制之與本命篇，亦有類似情形。特別有小戴記的哀公問與大戴記的哀公問於孔子篇，文字內容基本相同，兩書的投壺篇，不但文字大部份相同，而且篇名亦同。這大概正是隋志說「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的事實依據。

但是，孔穎達的禮記正義說：「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中庸是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序錄也說：「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又引晉陳邵的周禮論序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故清儒認爲，大戴、小戴之書係對流傳的禮記各有去取，小戴並未取大戴之書而刪之。現今所見的禮記，是經過後人整理的，已成爲集體著作，並非原貌了。

清人對二戴記的研究成果超過前代，著述頗豐，有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孔廣森的

大戴禮記補注、朱軾的禮記纂言、朱彬的禮記訓纂等等，其中孫希旦所著的禮記集解尤爲著稱。

孫希旦，生於乾隆丙辰（一七三六），卒於乾隆甲辰（一七八四），字紹周，號敬軒，浙江瑞安縣人，乾隆戊戌（一七七八）進士及第。曾參修四庫全書，歷任翰林院編修，武英殿分校官，國史三通館纂修官。一生博覽天文、輿地、曆算、卜筮等書，尤精三禮，後更專治小戴禮記。所著除禮記集解外，另有尚書顧命解一卷，求放心齋詩文集若干卷。

禮記四十九篇，記述了以周王朝爲主的秦漢以前的典章、名物、制度和自天子以下各等級的冠、昏、喪、祭、燕、享、朝、聘等禮儀。其中中庸、大學二篇，受到宋儒朱熹的推崇，使之與論語、孟子並列，合稱四書或四子，并爲之作了章句，爲南宋以後的統治者所重視，成爲封建文人的必讀之書。禮記全書文字古奧艱深，有些地方晦澀難明。孫氏的集解共六十一卷，以各篇記文分隸於其下。除學、庸二篇僅著篇目，下標「朱子章句」，不錄記文外，其餘四十七篇，每篇篇首基本上都作了題解。每節除沿用鄭注、孔疏而外，更博採宋、元以來各家之說，旁蒐遠紹，頗爲詳備。末加己見，對每一節的字、詞、語、句幾乎都作了詮釋，析疑解惑，大有助於研究古代經濟、政治、文教以及禮俗、制度。其於前人之說有異議者，則提出辯難，亦頗有創見。故其書頗爲晚近學者所採用，辭海中也有不少條目援引其

說。對於文句的斷讀，孫氏亦時有新解。例如周禮量人「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句，賈疏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以「學」字絕句，「歷」字連下。而禮記郊特牲「舉犛角，詔妥尸」節下，集解引量人此文則曰「歷與歷同」，以「學歷」二字連讀，解爲「尸所祭所啐之餘」。這樣解釋，確使文義由晦轉明。又如儒行篇「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鄭玄以「妄常」連文，注云：「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士靳，故相戲。」如此迂迴作解，義仍難曉。孫氏解之曰：「命，名也。妄，無實也。言衆人之名爲儒者，本未嘗有儒之實，故爲人所輕，常以儒相詬病。」此解較符記文原意，似勝鄭注一籌。

清人的著作，版本不多。本書的整理，以最通行的咸豐庚申瑞安孫氏盤谷草堂本爲底本。此本爲販書偶記所著錄，當是原刻本。據書目答問補正，此書尚有蘇州新刻本及永嘉叢書本兩種，前者遍查北京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及中華書局圖書館均未見，後者即盤谷草堂本的後印本，並非另雕新版。因無別本可校，故記文及鄭注、孔疏則參考阮刻本十三經注疏（校記中簡稱禮記注疏）及原上海中華書局依聚珍仿宋版排印的四部備要禮記、集解部份則參考原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中的禮記集解（校記中簡稱萬有文庫）。這種印本雖無版本價值，但也從中發現了一些異文。例如：王制「天子之縣內」節，集解引朱子曰「周襄王以原田與晉文」，萬有文庫無「田」字，喪大記「君

松梓」節，集解「梓八寸者梓九寸」，萬有文庫上「梓」作「棺」等等。至於集解中的引文，則絕大部份都查對了原書。惟古人引書，文字每有增損，其無碍文義者，則一仍其舊，概不出校（阮元已有校記者亦同），其有碍文義者，則都出了校記，依次編列注碼，附於本面之後。

本書卷首，載有孫希旦族子鏘鳴的禮記集解序，及孫氏邑人孫衣言所撰的行狀，全書之末，載有孫氏邑人項琪的禮記集解跋。此外，另附錄本書作者的尚書顧命解及孫鏘鳴的尚書顧命解跋，爲萬有文庫所未載。此二篇與禮記關係不大，但篇幅不長，今仍予保留。本書的點校，限於水平，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希讀者多提意見，不吝匡正。

沈嘯寰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孫鏘鳴序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樸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爲浩瀚未易徧觀。自元雲莊陳氏集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據多疎，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鑿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研精覃思，於書無所不窺，旁涉天官、地輿、鍾律、曆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著禮記集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鴈湖、几山兩先生屢謀鈔版而未果。咸豐癸丑，鏘鳴自粵右歸，被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則朱墨雜糅，塗乙紛糾，蓋稿雖屢易，而增改尚多，其間剪紙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素先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譬勘駁正之說，割記於簡端者幾滿，遂爲之參互考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六月開雕，中更寇亂，迄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費鳩工，藉同人之力爲多。夫禮四十九篇，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雜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一，於是訓詁家紛紜聚訟，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其繁蕪，掇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

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爲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先生易簣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稿。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清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也。族子鏘鳴謹序。

敬軒先生行狀

先生孫氏，諱希旦，字紹周，自號曰敬軒。先世有諱桐彪者，自永嘉徙居瑞安二十七都，鄉曰集善，里曰昭德。其所居數十百家，大抵皆孫氏，土人呼之曰桐田，實桐乾。祖德修，妣某氏。父珠，妣某氏。先生卽貴，祖父皆贈徵仕郎、內閣中書，加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妣皆孺人。蓋自徙瑞安至先生八世矣。先生幼有異稟，方垂髫，見羣兒嬉戲，獨端立不視。讀書三四過，卽成誦。初，文林君以老學不遇，祈夢於聖井山之許旌陽祠，夢神拊其背，嘔出心肝紙上，文林君愕然弗怡。時先生方在娠，及生而穎異絕人，乃悟曰：「紙者子也，此欲我成此兒耳。」輒閉戶課先生讀。年十二，補縣學生。後數年，諸城東舉先生視浙學，少許可，獨奇先生，以謂當爲古作者。時先生年甫及冠。乾隆壬午，舉浙江鄉試。己丑會試，挑取中正榜。中正榜者，會試榜出，主司擇其當中而限於額者別爲一榜，引見，以內閣中書、國子監學正用，乾隆以前舊制也。而先生引見得中書。辛卯，補授中書。四庫全書館開，先生爲分校官，以父憂歸。服除，中戊戌科進士，以一甲第三賜及

〔一〕〔五〕，萬有文庫本作「丁丑」。

第，授翰林院編修，復以母憂歸。服除，充武英殿分校官，國史三通館纂修官。四庫全書第一部成，議叙加一級。初修四庫書，大學士金壇于文襄公爲總裁，以王應麟玉海徵引繁博，俾先生專任校勘。至是，上以葉隆禮所爲契丹國志體例混淆，書法譌舛，又所採胡安國之論多謬說，詔館臣重加釐定，文襄遂并大金國志以屬先生。其明年，書成，天子以爲善，勅部議叙，而先生已病。今欽定契丹國志，世莫知爲先生手訂也。先生素清羸，既爲校纂官，日有國史三通之役，歸則從事二志，而四庫全書尚未成，天子屢下詔教趣，先生又在繕書所分校。同館者遇所疑，必就先生質正。又以其間爲門弟子講學，至於場屋文字，有來問，先生必爲之傾盡，食少而事繁。或謂先生毋過勞，先生殊不自覺也。已而林氏女卒於鄆城。女許字林觀平，壬辰進士，鄆城令露之子，未嫁而壻亡，先生尤悲之。其秋遂病痢，及痢已，猶不能行。比冬初，氣益逆，喘急，遂不起，乾隆甲辰十一月九日也。我瑞安自入國朝至乾隆時，逾百年，而先生始爲登朝官，遂由甲科入詞館，驟以文章學術折服其輩行。當是時，先生名動海內，天子宰相皆奇其才，方思有以用之，而先生卒矣。是殆先生之命也歟！先生自少以善事父母稱，與弟希夷盡其愛。持己甚嚴，而與人甚寬厚，務在相接以誠。居家不問生產，及在官，無車馬衣服之好，而遇人之急，常務竭其力。其爲學，務在博覽，自天文、地輿、曆算、卜筮之書，無所不研究。爲舉人時，餘姚邵晉涵，博聞

士也，與先生遇於舟中，初未知先生。及與論經史百家，先生滔滔不可窮，乃大歎服，曰：「才固不擇地而生也！」于文襄主戊戌禮闈，得先生所對策讀之，曰：「使他人檢書爲之，不能有此。」及榜發，同年生大集，謙主司。文襄至，見先生退然居人後，即手招使前，以語諸進士曰：「諸君一皆師事可也。」其爲當時推重如此。先生既以文學爲諸公貴人所慕嚮，而平生彌自矜惜，不苟趨勢利。在內閣時，將應會試，翰林某欲授以關節，先生笑弗受。及在翰林，大學士和珩慕其名，使人喻意指，先生絕不一往。遇鄉會試，輒前期杜門謝客，雖密友不得一見其面。既卧病，國史館猶月致公費錢，先生輒以在假辭不受，同館者皆以爲難。其於程、朱之說，尤篤信之，而務在實體諸身。嘗曰：「學道而以爲名，吾所恥也。」前卒數月，嘗爲觀心之詩，有「客感消除非外撻，主人閒暇且安居」之語。及疾亟，又口占爲詩曰：「人禽相去只幾希，天理橫流人欲微。病裏靜言半生事，茫茫四十九年非。」可以觀其所得矣。先生雖瘦弱，而氣特清峻靜深，見者皆知爲端士。爲諸生時，善學子文，頗自喜，嘗自言曰：「我平生它著述不敢自信，至制義則透過來矣。」又自謂其文過羅文止，但不及章大力。然自少喜金正希、陳大士，故不利科舉，若自陶庵人，則當早得科矣。其於諸經，尤深於三禮。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意爲之註釋，謂之注疏駁誤。己亥居憂，主中山書院，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爲集解五十卷，其大